

# 評趙著《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

馮啓宏\*

書名：《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  
作者：趙岡  
出版者：台北聯經書局  
出版時間：民國八十四年  
頁數：231頁

---

就整個學術界而言，城市研究是個很重要的課題。因為城市不僅是文化的中心，更是政治、商業、學術思想、乃至於宗教信仰的中心。所以城市形成及其發展過程，不但受到歷史學者的注目，亦引發其他相關學科研究者的濃厚興趣，而出現許多關於城市研究論著。其中，美國威斯康辛州州立大學以研究制度派經濟史著稱的教授趙岡，其之大作《中國城市發展論文集》的出版，

---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對中國城市發展史的概況，有一番不同的詮釋，頗值得介紹。

## 二

雖說過去關於中國城市史的研究專著甚多，但是趙岡對其成果顯然並不以為然。因為對具有經濟學背景的趙岡來說，傳統中國歷史學家以「坊巷志」或「地方志」方式研究城市史的作法，實在得不到他的認同。故趙岡在序言中，一開始就對過去歷史學者在研究城市史專題時「日趨細緻」、「太過小題大作」的現象，予以強烈的批判。他認為作研究時「過份細緻的追索沒有必要，甚至是一種人力之浪費」，而小題大作的結果，只能見樹不見林，無法看出全貌<sup>1</sup>。趙岡進一步評論道，許多知名歷史學者把明清江南各大市鎮，以現代文體寫出「坊巷志」，「只是滿足了著者個人的興趣，不能幫助我們瞭解這些城市的興衰背景」<sup>2</sup>。因此，為彌補過去歷史學界「沒有留下一部整合性城市史」著作之缺憾，趙岡遂立志以宏觀角度從經濟層面上來探討中國城市的發展及其問題。

「以宏觀角度從經濟層面來探討中國城市的發展」，正是趙岡寫作《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全書的立論出發點。何謂「宏觀角度」？他指稱，過去中國史學家因受到西方的影響在研究中國城市發展時，只偏狹地注意到城市化的動力——即所謂的工業化問題，而忽略了「中國城市化所面臨的強大制約與阻力」。正因為如此，中國史學界始終「難以真正認識中國歷史上城市化的諸問題」。所以趙岡再三強調，研究一個國家城市化的過程與速度，不僅應注意到促成城市化的動力，更應以「宏觀角度」來審視「這個運

<sup>1</sup> 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台北：聯經，1995年），〈序言〉，頁1。

<sup>2</sup> 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序言〉，頁1-2。



動所遭遇的制約因素」<sup>3</sup>。

趙岡所謂「城市化過程所面臨的制約因素」，即是來自經濟層面。「因為人類的經濟活動沒有不受制約條件影響的，城市化進程當然不可能例外」<sup>4</sup>。趙岡更進一步指出城市發展過程中，來自經濟方面的主要制約因素有二，第一是城鄉人口流動性的大小；二則是城市的糧源問題。他指稱：「城市發展主要表現在城市人口之增加」，「所以城市化過程要靠外來人口移入填充」。因此，「城鄉人口交流的自由度；用經濟學術語來說，就是勞動力供給曲線的彈性」就決定了城市化發展的速度。再者，城市人口大部份是非農業人口，必須從外界——尤其是農村取得足夠的糧食供養城市人口生活。「於是，農村的餘糧率，即農民自我消耗後所剩餘的糧食占糧食總產量的比重」，就決定了一個國家城市化的上限<sup>5</sup>。

雖說各國的城市史發展，都受到城鄉人口流動的自由度及城市的糧源問題兩制約因素的影響，但在程度上，趙岡卻指出中國與歐洲有明顯差異。因為相對於中世紀歐洲受制於「莊園制度」，農村人口不能自由遷居城市，「人力來源」成為中世紀西歐城市最大制約因素的情形，中國在西周封建制度下所產生的「國鄙之分，到戰國時期已然趨於消失」，不僅「國野開始爭民」，而且城鄉人口擁有高度的流動自由<sup>6</sup>。在此情況下，再加上歷史上中國沒有從外國大量輸入糧食的可能，農村餘糧扮演了城市糧源主要供應者的角色，農村的餘糧率就成為影響中國城市進程的決定性因素。

「中國從戰國時期以降，人口來源不是城市發展的制約，糧食供應才是主要的制約」論點，正是趙岡貫穿中國城市發展史的

<sup>3</sup> 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一章：從宏觀角度看中國的城市史〉，頁4-5。

<sup>4</sup> 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一章：從宏觀角度看中國的城市史〉，頁4。

<sup>5</sup> 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一章：從宏觀角度看中國的城市史〉，頁5。

<sup>6</sup> 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二章：先秦城市〉，頁37。



主軸<sup>7</sup>。是故趙岡在參照中國各朝代的農業生產力——即農業的餘糧率及秦漢以來城市人口變遷情形後，將中國城市史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春秋戰國到南宋末年。此時期大體上糧食數量不斷提高，餘糧率隨之上升，因此不僅城市人口比重愈來愈重，城市規模也由二三十萬人上升到南宋臨安城的二百五十萬人。（二）南宋以後，進入第二階段。這個時期由於人口快速增加，平均餘糧率大幅下降，城市規模亦為之縮小，而城市人口不再往大都市反而向農村集中的情況下，形成江南地區的眾多市鎮。（三）十九世紀中葉五口通商以後，城市化進程轉入第三階段。此時拜開放通商之賜，大量外國糧食進口，彌補了國內糧食供應不足的情形，農村餘糧率所形成的制約減弱，城市人口大量回升，城市規模日漸擴大直至今日<sup>8</sup>。

糧食供應既然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主要制約因素，那麼將農村糧食送至城市的運輸條件及成本，也成為決定城市人口集中程度的一個重要課題。關於這個問題，趙岡在〈第五章：歷代都城與漕運〉中指出，中國自秦漢以後花費人量財力物力及成本不惜成本修築國都與農業生產地區之間的漕運，即是農村餘糧供應絕大部份城市人口糧源的重要表徵。而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糧食供應區亦隨之擴大。換言之，歷代都城規模與糧食供應區的大小成正比<sup>9</sup>。

糧食供應不僅決定歷代都城的規模及進程，亦促成了江南市鎮的興盛。對於此問題，趙岡花了三章篇幅作探討<sup>10</sup>。趙岡指稱，過去雖有不少關於江南市鎮史的研究佳作，但是如同中國城市史

<sup>7</sup> 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四章：中國歷史上的大城市〉，頁 82。

<sup>8</sup> 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三章：秦漢以來城市人口之變遷〉，頁 76-78。

<sup>9</sup> 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五章：歷代都城與漕運〉，頁 113-115。

<sup>10</sup> 其包括〈論中國歷史上的市鎮〉、〈明清的新型市鎮〉、〈明清江南市鎮的絲業與棉業〉等三章。以上內容請參閱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六、七、八章。



論著般，「留下了一個很關鍵性的空白點——缺一個宏觀的詮釋」。在趙岡眼中，中國市鎮發展——尤其是明清時期江南市鎮數目的快速增長，絕對不是「一個自然而正常的過程」<sup>11</sup>。因為相對於西方市鎮扮演「城市化的過渡階段」角色——即小市鎮終發展成大中型城市，市鎮在整個城市人口中的比重愈來愈小的此一情形，中國明清時期的市鎮發展卻不像是一個過渡階段，且市鎮人口的比重也愈來愈大。因此，如果不以宏觀角度，則根本不能清楚詮釋此一各國市鎮發展史上的“特例”。

更進一步言，趙岡認為中國市鎮在宋代以後分化成兩種類型，一種是「傳統型市鎮」，另一種是宋以後才出現的「非傳統型市鎮」。傳統型市鎮，「是農戶手中剩餘農產品，尤其是糧食的收購點，同時也是手工業品的分發點，這個基本功能，兩千多年來始終未變」<sup>12</sup>。至於「非傳統型市鎮」，不僅興起的原因，其功能、特性與結構均迥異於「傳統型市鎮」，而明清時期大量出現在江南地區的新型市鎮即屬於此類型。

江南地區新型市鎮的快速增加，與明清時期的人口過剩現象有密切關係。趙岡指出，中國在明清時期人口過剩情形極為嚴重，但由於宋代以後農業生產部門的餘糧率已不足供應更多的城市人口，農村成為唯一能吸收過剩人口的地方，農村人口因而大增。但在耕地面積沒有擴大的情況下，單靠農業生產已無法維持全家生計。因此「以副助農」，農戶生產手工業到市場出售換取糧食，成為唯一辦法。在此情況下，最符合農村家庭手工業生產條件——不需太多資金、沒有顯著規模、不必有很高的生產技術、不需太多人操作、生產程序不太複雜的棉紡織及絲織業，遂變成最佳的選擇對象<sup>13</sup>。在愈來愈多農戶投入棉、絲業生產行列的同時，由於「江南地區以外的中國人口也在膨脹，擴大了江南地區絲織品及棉織

<sup>11</sup> 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六章：論中國歷史上的市鎮〉，頁 139。

<sup>12</sup> 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六章：論中國歷史上的市鎮〉，頁 154。

<sup>13</sup> 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七章：明清的新型市鎮〉，頁 175。



品的銷路。加以清朝中葉以後對外貿易迅速擴張，生絲與絲織品的出口增加」等有利因素刺激下，明清時期的江南市鎮大為興盛<sup>14</sup>。綜觀《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一書，顯然作者趙岡認為要研究中國歷史上的都市化（Urbanization），在處理城郡（Cities）與市鎮（Market towns）兩課題時，不僅要分開來討論，而且不能將歐洲都市化的模式硬套在中國城市發展問題上。因為中國城市的發展過程，不但是其他國家都市化歷史中從未出現過的現象，更是中國歷史上特殊條件的產物。因此，唯有透過「宏觀的角度」一如城市發展進程中的制約因素來探討，方能釐清。其中，「農村餘糧率」更是決定中國歷代城市發展的關鍵因素。

### 三

就整個歷史學的研究而言，與社會科學關係密切的所謂「新史學」（new histories）之崛起，無疑是近三十年來最驚人的發展。確實，新史學的社會科學式歷史研究法（Socialscientific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inquiry）不僅刺激了傳統歷史學的思考模式，擴大了歷史學的研究領域，更創造出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不過，歷史學畢竟不是社會科學，學者在運用社會科學方法來「輔助」歷史研究時，分寸必須拿捏清楚。因為社會科學一旦「反客為主」，逾越了歷史學的界限，那麼爭議就很難避免。趙岡著《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一書，其內容最受議論的地方也在於此。

以研究人類行為經驗為主的社會科學家——不論是心理學者、社會學者、政治學者、乃至於經濟學者，縱使他們研究的「事件」與歷史學者相同，但他們所重視的也不過是整個事件的「不變性」，即每種不同情況下表現出的共通性——「通則」所在。因為找尋固

---

<sup>14</sup> 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八章：明清江南市鎮的絲業與棉業〉，頁 201。



定因果關係的「通則」或普遍性的「定律」，正是社會科學研究者的終極目標。而此目標也是經濟學者出身的趙岡，研究中國城市史的主要著眼點。在趙岡眼中，「農村餘糧率」糧食供應的制約，就是中國城市發展史的「通則」。所以，《中國城市發展史》全書的研究起迄年限雖從先秦至清末長達兩千多年，但是其內容卻可以簡單地用「糧食供應決定了中國歷代城市發展史」這句話「一言以蔽之」。對於此點，糧食的供應當然會影響一個國家城市化規模與速度，但問題是趙岡只以糧食供應此「唯一」經濟因素，來詮釋整個中國的城市史，未免太過小覷歷史學本質的複雜性，甚至忽略了其研究對象是一個有廣大疆域、眾多城市且悠久歷史的國家——中國。

經濟因素確實主導中國的城市史嗎？關於此點，答案可能不是很樂觀。韋伯在其經典著作《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就指出：「綜觀人類的歷史，經濟活動始終是臣服於政治和宗教力量之下的」<sup>15</sup>。確實，在資本主義興起前，政治與宗教主導了中、西方的歷史發展。在西方，宗教力量扮演主要角色；而在中國，政治力量則超越了宗教，推動著中國歷史的前進。政治因素主導中國歷史演進此一特色，表現在中國城市的發展史——尤其是中古以前的國都型城市，更是如此。因為在中國自古「地區性的經濟不足以支持大型城市的生存和發展，只好依靠政治力量」，此從中國「中古以前作為國都的城市的盛衰和朝代的興亡息息相關」一事可作為明證<sup>16</sup>。

因此，縱使「農村餘糧率」可能會對中國中世紀以後，依賴地區經濟供應而非依靠政治力量生存的新興工商業型城市之發

<sup>15</sup> 以上內容轉引自龐建國，《國家發展理論—兼論台灣發展經驗》（台北：巨流，1997年8月），頁49。

<sup>16</sup> 劉石吉，〈城郭市—城市的機能、特徵、及其轉型〉，轉引自《中國文化新論經濟篇——民生的開拓》，頁325。



展，造成深遠影響，但企圖以唯一經濟因素來詮釋整個中國城市的發展史，作法顯然並不恰當。

政治因素主導中國都城發展，在歷史上實不乏其例。如中古時代世界第一大城的長安城，在大唐帝國光芒灰燼後進入歷史。北宋國都汴京，也隨著北宋的滅亡而告中衰等均是明證。但是何以趙岡沒有注意到此一重要因素，而只強調經濟因素對中國城市的影響？關於此點，其實並不能苛責趙岡。因為應用社會科學的方法或理論研究歷史時常犯的毛病，就是只強調自己學科或專業知識的那一部份對歷史發展之重要性，而忽略必須以「全面的」、「整體的」角度來研究歷史的基本要求。所以，軍事學者或交通運輸專家研究城市史，「戰爭」及「航運」可能就是他們心目中決定城市興衰的主要因素。而經濟學者出身的趙岡，當然會認為「農村餘糧率」此經濟因素制約了中國歷代都城的發展。但是，單一因素所建構出來的歷史圖像，只說明了部份事實，而非歷史真相。

除了尋求「通則」，強烈企求從歷史經驗中建構出一套「發展理論」，是社會科學家研究歷史的另一中心目標。但問題是，這些社會科學家在建構歷史「發展理論」時，常有「簡化」歷史面相甚至「漠視」史料的缺憾。趙岡在全力建構其中國城市史發展理論時，也有此現象產生。例如，全國人口總數是判斷一個國家農業生產量及城鄉人口比重相當重要的依據。可是趙岡在探討「秦漢以來城市人口之變遷」問題時，卻說其「所使用的歷史資料，可靠性當然不是很高，推估得出的結果自然會有相當大的誤差」<sup>17</sup>。雖說趙岡一再強調此種誤差不會影響其所顯示的變遷方向與升降趨勢，但是如此一個重要數據資料，在沒有確切證據的情況下仍大作文章是很有爭議的。

再者，趙岡既以「中國城市發展史」作為書名，研究中國的城市化問題，但是他除了在〈緒論〉裡對「城市」作了解釋外，

---

<sup>17</sup> 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頁 53。





居然沒有定義何謂「城市化」<sup>18</sup>。這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缺失，因為趙岡假若不反對一般學者對「城市化」的定義——「小城市越來越大，大城市越來越多」<sup>19</sup>，那麼趙岡主要建構的中國城市發展三階段理論就很有爭議。在趙岡的理論裡，中國城市發展的第二階段，城市化進程是陷入停滯的。此緣因於南宋以後人口不再向大都市集中，反而向農村靠攏<sup>20</sup>。可是從另一角度來看，人口靠攏農村的結果是形成眾多江南市鎮，而終有江、浙等地多達上百萬人口工商業大都市的出現，這何嘗不是「城市化」？顯然，趙岡的理論——至少在修辭用語上，仍需多作修正。

更進一步言，以一手史料檢驗趙岡的中國城市發展理論，還可以發現其他值得討論的地方。在趙岡論著中比較令人注目的另一個論點，是明清時期江南市鎮興起的主因，並非一般研究所指的與商業資本主義的萌芽，而是江南地區的人口過剩此一因素。可是據明代的在籍戶口記錄及何炳棣的估計，明代人口的分佈「北增南減」現象非常明顯<sup>21</sup>。此一原始史料，至少衍生出兩個重大問題。第一，從數據上顯示中國北方也面臨了人口壓力問題，那麼何以沒有像江南地區產生眾多中鎮？第二，很多學者都指出，實際上當時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區人口增長速度絕對比北方更快，否則不會出現這麼多的新市鎮。可是江南地區的戶口統計並沒有反映出此一數字。顯然，戶口統計只針對在籍戶口，而有許多外來人口並未登記。那麼這些人到江南地區的目的為何？關於這兩個問題，唯一合理解釋是造成江南地區人口過剩的主因，不在人口的自然繁殖，而是外來人口。而商業資本主義萌芽創造出的就業機會，正是這些外來人口到江南市鎮來的誘因所在。因此，指人口過剩是造成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市鎮興起的主因，很明顯有倒

<sup>18</sup> 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頁2。

<sup>19</sup> 同註16，頁328。

<sup>20</sup> 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頁25。

<sup>21</sup> 以上資料轉引自閻守誠，《中國人口史》（台北：文津，1997年8月），頁276。



果爲因的意味。

整體而言，社會科學不同於歷史學的訓練方法及理論基礎，正是趙岡著《中國城市發展史論文集》論點較引人注目的原因所在。雖說學科間交流下所得的論點，尚有許多議論空間存在，但「以彼之長、補己之短」誠心學習其他學科的優點，不僅可以刺激思考模式，更能創造出新的研究領域確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近年來學術界頗有新收穫，即爲學科交流下的成果。但是，一味以「自我中心」的態度來作學術研究，在不了解其他學科的本質情況下，就侈言批評其研究者「缺乏宏觀」、「小題大作」，甚至「浪費學術生命」，則不免令人有「文人相輕」、「以管窺天」之慨了。

